



京华学术文库

中国 散文 通史
ZHONGGUO SANWEN TONGSHI
主编 漆绪邦



增订本【下】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京华学术文库

中国 散文 通史
ZHONGGUO SANWEN TONGSHI
主编 漆绪邦



增订本【下】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 / 漆绪邦主编. —增订本.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56-2039-3

I. ①中… II. ①漆… III. ①散文—文学史—中国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9398 号

ZHONGGUO SANWEN TONGSHI

中国散文通史(增订本)·下

漆绪邦 主编

责任编辑 张慧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609 千

定 价 260.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第七卷 明代散文

概 述	002
第一章 明代前期散文	021
第一节 元明之际及洪武时期的作家	021
第二节 “三杨”与台阁体	042
第三节 解缙、马中锡等人的散文	048
第二章 明代中期散文(上)	059
第一节 复古的先声——李东阳与茶陵派	059
第二节 李梦阳、何景明与“前七子”	064
第三节 李攀龙、王世贞与“后七子”	075
第三章 明代中期散文(中)	086
第一节 唐宋派的理论主张	086
第二节 王慎中、唐顺之	089
第三节 归有光、茅坤	098
第四章 明代中期散文(下)	111
第一节 王守仁等理学家的散文	111
第二节 文徵明等书画家的散文	121
第三节 李开先等词曲小说家的散文	132
第五章 明代后期散文(上)	142
第一节 李贽的思想和创作	142
第二节 徐渭、汤显祖	148
第三节 公安三袁	158
第六章 明代后期散文(下)	179
第一节 竟陵派	179
第二节 王思任、刘侗、徐弘祖	187
第三节 张岱及其他小品文作家	194

第四节 明末文社与志士之文	203
---------------------	-----

第八卷 清代散文

概 述	212
-----------	-----

第一章 清初学者的散文	230
-------------------	-----

第一节 黄宗羲	230
---------------	-----

第二节 顾炎武	236
---------------	-----

第三节 王夫之	243
---------------	-----

第二章 清初作家的散文	251
-------------------	-----

第一节 侯方域与雪苑社	251
-------------------	-----

第二节 魏禧与易堂九子	260
-------------------	-----

第三节 汪琬和他的散文圈	266
--------------------	-----

第四节 归庄、王猷定、周容	272
---------------------	-----

第五节 钱谦益、吴伟业	279
-------------------	-----

第三章 康雍散文	287
----------------	-----

第一节 朱彝尊、王士禛、潘耒	287
----------------------	-----

第二节 姜宸英、计东、邵长蘅、廖燕	293
-------------------------	-----

第三节 叶燮、冯景、李绂、韩菼	301
-----------------------	-----

第四章 乾嘉散文	307
----------------	-----

第一节 袁枚、蒋士铨	307
------------------	-----

第二节 全祖望、章学诚	313
-------------------	-----

第三节 乾嘉学者的散文	317
-------------------	-----

第五章 桐城派前期及阳湖派散文	323
-----------------------	-----

第一节 戴名世	323
---------------	-----

第二节 方 苞	331
---------------	-----

第三节 刘大櫟	339
---------------	-----

第四节 阳湖派	344
---------------	-----

第六章 桐城派中后期散文	351
--------------------	-----

第一节 姚 鼐	351
---------------	-----

第二节 姚门弟子的散文	357
第三节 桐城派后期散文	365
第七章 清代骈文	372
第一节 清代骈文复兴及其原因	372

第九卷 近代散文

概 述	388
第一章 启蒙时期的散文	394
第一节 龚自珍	394
第二节 魏源、林则徐	406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散文	421
第四节 冯桂芬、王韬	433
第五节 郑观应、马建忠	445
第二章 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散文	459
第一节 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和政论	459
第二节 谭嗣同、唐才常	471
第三节 梁启超的新体散文	483
第五节 严 复	508
第六节 黄遵宪、汪康年、夏曾佑	519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散文	529
第一节 孙中山、朱执信	529
第二节 章太炎、邹容	538
第三节 黄兴、陈天华、秋瑾等	548
第四节 南社诸作家的散文	560
增订后记	570

第七卷

时代散文

邱少华 撰写



概 述

中国散文在有明一代的发展，不似有的论者所说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马鞍形，前后均称繁荣而中间衰微；也不大像纺锤形，中段繁荣而两头不及。它大体是一个斜坡形，一个上行时平缓绵长，而到达高峰后迅速滑落的斜坡。明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间跨度长短不齐的阶段，既是前后相承相续的过程，其中又有反复，有交错。

自明太祖洪武建国，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到孝宗弘治，共一百三十年，几占明朝历史纪年的二分之一，是明代文坛长期沉寂，散文创作发展极为缓滞的时期。朱元璋取得政权后，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专制皇权，巩固新王朝的统治而尊崇程朱理学，钳制思想自由。他出身寒微，当过和尚，又做过“贼”（农民起义军），称帝后仍有某种自卑感，疑心重，忌讳多，往往借小故大兴文字狱，恫吓士大夫。著名的散文家宋濂、刘基、王祿等人，在元末已度过了创作的高峰期，入明之后，精力主要用在修饰新朝文治。如宋濂，“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献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而且他们在洪武前期即相继去世。著名诗人兼散文家高启，以细故为朱元璋所杀（洪武七年）。当时，连一般的歌功颂德的贺表，因为有“作则（贼）垂宪”、“睿性生（僧）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藻饰（早失）太平”等字样，作者均被处死。著名的“吴中四杰”，高启腰斩；杨基“被谗夺官，谪输作”，死于工场；张羽“坐事窜岭南”、“投龙江以死”；徐贲“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在这

样的摧残下，所谓文学繁荣，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并不存在。

成祖朱棣，面临着一个继续巩固新王朝的任务，又有一桩“篡夺”的心病，也需要借杀戮以立威。即位之初，就杀了大儒方孝孺；永乐十三年，又杀了得到太祖赏识的著名才子解缙。除了政治高压外，洪、永两朝还通过科举、学校来强化思想统治。洪武二年（1369），诏天下郡县立学；三年，定科举法；十七年，颁行科举成式。《明史》卷七十《选举》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命题。”“《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至永乐十三年（1415），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定《四书大全》三十六卷，《五经大全》一五四卷，《性理大全》七〇卷，共计二百六十卷，为读书人提供一套更为现成、更加方便的教科书，科举功名已全在此，似乎古书和学问也全在于此。熟读《四书》与朱注以应科举，是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光荣的出路。“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卷七〇《选举》二）

在这种情况下，文坛上的“台阁体”由永乐酝酿，至宣德、正统而大盛，影响风气者达数十年之久，就不足为怪了。杨士奇、杨荣于永乐初入阁参预机务，杨溥于洪熙元年（1425）入阁，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执政时间长者四十年，短亦二十年。《四库全书总目》论“台阁体”云：

（杨）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泠泠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骋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于肤廓冗长，千篇一律。

这是对三杨倡导的“台阁体”的比较全面的评价，指出了它产生的根源（社会的与个人的）、特点和流弊。唐初有所谓“上官体”、“沈宋体”，前人讥其浮艳骈俪；宋

初有“西昆体”，其特点是富丽精工；明初“台阁体”则以雍容舒缓见长，文章风格各不相同。其共通之处是：都在为一个初兴的、强大的统一王朝敷扬文治，点缀升平。清人冯班评西昆体云：“昆体壮丽，宋之沈、宋也。开国之文必须典重。”（《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九）四库馆臣则说台阁文“有富贵福泽之气”，“与山林枯槁者异”，立论的角度完全一致，看出了其共同特点是敷扬文治，点缀升平。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上层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新兴王朝鲜花着锦的时期，上官体、沈宋体和西昆体作家奉献的是热烈、欢欣与华美，而三杨奉献的是雍容和典则，更显出台阁重臣的风度与涵养；只是过于单调，使人感到沉闷罢了。

自弘治、正德（元年，1506）之际，经嘉靖朝至万历前期，八十余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文学复古思潮空前高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走向活跃和繁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是“前七子”、“唐宋派”和“后七子”。前后七子高唱文学秦汉，诗学盛唐，是要复先秦西汉之古，可以合称为“秦汉派”。“唐宋派”要复韩、柳、欧、苏之古，其中包含通过韩、欧上追秦汉的理想。复古的取径不同，复古的观念意识并无根本的分歧；而前人对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的优劣得失的评价，也大体一致。

明代前期虽有开国之盛，有仁（宗）宣（宗）之治，有弘治“中兴”；但土木之变以后，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开始暴露并逐渐尖锐起来了。正德一朝，宦官乱政，藩王谋反，内部已极腐败，农民起义遍及江西、湖广。这种种危机加深了人们对统治集团与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怀疑，陆王心学应运而生；士大夫关心时局，思想活跃。于弘治、正德之交走上文坛的前七子，在入仕之初大都节义凛然，正直敢言，勇于指斥朝政，抨击宦官和权贵，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直接引发文学上的复古高潮的，则是台阁体和八股文的泛滥。李梦阳，何景明等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勿道。崛起于嘉靖中期的李攀龙、王世贞等称为后七子。他们高度评价前七子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并继续高举他们的旗帜，将秦汉派掀起的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于嘉靖前期进入文坛，晚于前七子约二三十年，与后七子大体同时而略早。他们的文学主张与散文创作实践，以唐宋八大家为楷模，尤重韩、欧、曾、巩。唐宋派作为秦汉派的对立面，对前

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口号，抨击也很激烈。归有光说：“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七《与沈敬甫》）“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震川先生文集》卷二《项思尧文集序》）。一则极尊宋元大家，一则痛斥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为妄庸巨子，为撼大树的蚍蜉。《明史·文苑传序》在叙述这个斗争过程时说：

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李、王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

后人论唐宋派，颇多褒辞；论秦汉派（前后七子）则大抵肯定其振衰救弊之功，而否定其散文创作的成绩。

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陈陈相因……（李）梦阳振起痹痿，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于盛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

（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李于鳞（攀龙）、王凤洲（世贞）皆剽窃字句，短钉成篇；创为不读汉以后书，特自高欺世耳。（张谦宜《观斋论文》卷六）

王弇州（世贞）《四部》出，传钞殆遍。其时弇州目中，那里有唐荆川（顺之）、王遵岩（慎中）、归震川（有光）三人？然究其终极，则弇州之文比三人不如也。（章廷华《论文琐言》）

近人钱基博颇扬七子而抑唐、归，“明有何、李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孱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与韩、柳为异，以扬六朝之颓波耳。”但论及七子的散文创作，钱氏仍依前人之见，有所保留：“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多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者，故不独一攀龙。”（《明代文学·自序》）

今就下列各点，将秦汉派与唐宋派略作比较分析。（一）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唐宋派偏重“道”的一面，强调正统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没有多少新的发明与进展。秦汉派偏重“文”的一面，强调诗文的格律法则，进行了各种具体的探索，并由格律法则而及声情，其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某些思想，甚至能给创新者以启发。（二）关于学习古人。唐宋派的言论比较稳当，周密，也比较切实；因为八大家毕竟与明为近，容易入门，刻鹄不成，不失为鹜。秦汉派的代表人物恃才傲物，大言欺世，理论疏失亦多。一派之中，常有矛盾；一人之论，前后也有变迁。（三）所以，在创作实践方面，唐宋派的作品一般都平易通达，读者易于接受。秦汉派文章虽然不都是“钩章棘句”、“聱牙戟口”、“不能终篇”，但确实制造了不少假古董，为人所讥。艾南英说：“夫秦汉去今远矣。其名物、器数、职官、地理、方言、俚俗，皆与今殊。存其文以见于吾文，独能存其神气耳。”（《天佣子集》卷五《答陈人中论文书》）“存其神气”而不摹字句，正是唐宋派的宗旨。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已指出勉强摹仿古人言语的错误。他说：“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史通·言语》）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论语》一书，语言与《书》、《易》不同；司马迁记先秦事，已在改译古籍文句。明朝人要跨越唐宋而学语于秦汉，不亦难乎。前后七子之失，首在于此。从王世贞的晚年“悔悟”，亦可见其中消息。

万历中期经天启至崇祯末年，前后五六十年，为明代散文发展之第三期。概括地说，第一期是保守期，第二期是复古变化期，第三期是创新期。在这个阶段，文学思潮和散文创作出现了某种新的质的变化。其主要代表是“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进入文坛之初，正是唐宋派与后七子的旗手相

继去世，复古主义的文风的流弊全面暴露的时候。不仅古文不振，时文也腐臭了。神圣得了不得的“代圣贤立言”的举子业，竟然不遵程朱宗旨，夹杂着二氏（佛、老）之言与稗官杂说。不仅前后七子的文风有弊，唐宋派末流也不能无弊。纪昀说：“自前明正德、嘉靖间，李空同诸人始以摹拟秦汉为倡，于是人人皆秦汉，而人人之秦汉实为一音。茅鹿门以摹拟八家为倡，于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谓欤！久而自厌，渐辟新途。”（《香亭文稿序》）又需要有人出来振衰救弊了。从散文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来说，已经出现了改革变化的紧迫要求。再看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和官场的混乱、黑暗及其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压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壮大了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的有形无形的影响，尤其是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叛逆精神的激发与推动，给文学创新提供了外部条件。公安派的理论和创作，正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三袁的文学主张最重要的是：强调文学是发展的，前进的；强调诗文创作最可宝贵的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这两点认识出发，他们坚决反对复古与摹拟。袁宏道称赞老子、庄周、荀况的文章“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与张幼于》）。尖刻地嘲诮秦汉派末流的创作是“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的陈词滥调（同上）。三袁不仅在理论上大张旗鼓地挹伐复古与摹拟，在创作上也做出了明显的可贵的成绩——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大量散文作品，从言志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用以反映自然的韵趣和意境，描述日常生活的生动情景，抒写自己的心灵与个性。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也力求破除陈旧的规矩，另辟新径。公安派之后的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与谭元春，理论的开拓和创作的成绩不如公安，但他们的基本宗旨，仍然是反对复古和摹拟，追求思想和艺术的解放。

明代后期反复古主义的斗争，以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为先驱，以公安三袁为高潮，以竟陵派为后劲，再加上与公安、竟陵大体同时的许多作家，形成一个声气相通的创作群体，经过前后数十年的努力，在散文领域取得的一个具体成果，就是被称为“小品”的一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成为文坛新苑。几百年中，由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不易动摇，晚明小品一直受到歧视和贬斥。《四库全书总目》首先承认袁宏道诗文“致天下耳目于一新”，然后说：

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卷一七九）

林纾又进一步加以严谴：

若公安则恣肆不畏人，纪文达斥其“破律坏度”，此四字足以定其罪矣。……盖古文非可以随意挥洒者也。一染竟陵、公安之习，则终身不可湔涤矣。（《春觉斋论文》）

在这些学者看来，能“致天下耳目于一新”的文章，不如假古董。今天，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当时，重新评估晚明小品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明代后期散文（主要指小品文）的成就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它是在明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局面新气象之中，与小说、戏曲、书画等文艺门类相互影响、相互激发而产生的成果。它虽然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毕竟具备了某些明显的叛逆性质，体现了当时反传统反理学与追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二）它无论在思想观念和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和技法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开创性，反对陈旧模式，反对八股束缚，冲击传统古文观念，解放古文文体，在文学发展史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前人所未有的成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才被指责为“破律坏度”，罪孽深重，“不可湔涤”。（三）体现了创新精神的晚明小品，是明代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然而，它繁荣得快，凋谢得也快，还不如复古思潮那样有“生命力”。其根本原因，一是环境的恶劣，一是自身的脆弱。

试观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之白话文和自由诗，是在崭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产生的。其本质与旧体诗文之迥异，自不必说；而就其技巧和方法之纯熟而言，却未必能驾文言文与旧诗而上，这就使得保守派有置喙之地，处心积虑加以攻击排斥。白话文的胜利，首先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胜利，其次才能归功于倡导者和写作者。公安、竟陵之文，其内质自不能与五四新文学比；而技巧之成熟，未必不在初期的白话之上。但是，它终究夭折了。这个事实，首先说明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曙光的消失，其次才是创始者的弱点。崇祯时代，明王朝已是山穷水尽，内忧外患，风雨如磐。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使文学理论和创作又向传统回归。独抒性灵，描写自然的

小品不能匡时补世，救国救民，自然要受到痛斥；人们又把眼光投向宗经之文，载道之文，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了。这一类的呼吁并没有挽救王朝的覆灭，而小品却受到可怕的指责，要承担亡国的罪名。今天看来，晚明小品新花的早谢，除了创作者本身的思想、见识和才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没有给它们提供足够肥沃的土壤和足够充沛的雨露阳光。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制约。上面叙述明文分期，已大致提到了各阶段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了进一步探索明代散文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所具备的特点，下面拟从复杂纷纭的明代文化现象中选取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说明它们如何影响了明代文坛和明文创作的风貌。这些方面是：明代文学思潮中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的过程与实质；明代哲学思潮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消长及其与散文创作的关系；明代的士林风气及其对散文创作的影响。

一、明代文学思潮中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的一贯性与地域性

作为最古老的文体之一的散文，发展到唐宋，已经完全成熟了。韩、柳、欧、苏以复古为创新的旗帜和途径，继承先秦两汉的优良传统，写作了面目一新的文章。到明代，散文如何“起衰”，如何发展？从借鉴前人经验的角度考虑，最现成的答案是复古。事实说明，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唐宋古文运动成功了，因为这个运动的实质是创新。唐诗之后的宋诗，却不能通过复古来另辟蹊径。面临唐宋全盛之后的明代散文，正如面临唐代全盛之后的宋代诗歌，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手段去打开局面。可惜，明人走了一条现成的路子。文学复古思潮在明初就开始酝酿了。文坛领袖宋濂将文章归结为“君臣父子之伦，礼乐刑政之施。”（《曾助教文集序》）乃至推崇“唐虞之时”、“三代之际”的社会文化制度，持论的迂阔，与北宋初年学者柳开的复古思想（《应责》：“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也；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颇相类似。当然，宋濂毕竟时代较晚，取法对象，多了一个欧阳：“六经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也”（《文原》）。明代中期唐宋派，正是继承宋濂，以韩、欧、曾巩为学习对象的。这是复古派中的稳健派。他们都是南方人。最早起来针对台阁体而提倡复古的李东阳，主张亦大体平正，并不刻意于摹仿。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庆阳

人)、何景明(信阳人)开始变得激进,掀起拟古高潮。钱谦益说:

北地(庆阳古属北地郡)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谟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李东阳)为能事。(《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这里特别标出“关陇之士”,似乎注意到了复古派中的激进派,多系北方人,后七子的领袖之一李攀龙(济南人),言论更加片面。从另一面说,富于独创精神、反对摹拟剽窃的,多为南方作家。这是因为自唐宋以来,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南方地区成为新思想新风气酝酿滋生之域。在前七子“劫持一世”的时候,以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为代表的吴中才士,偏能卓然自立,无所依傍。四库馆臣评其人品与文风,有云:“(祝允明)与同郡唐寅并以任诞为世指目。寅以画名,允明以书名,文章均其余事……(祝允明)文亦萧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巨观,而一丘一壑,时复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一格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清代古文家方苞说: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话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见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方苞的意见也许就是前引林纾“盖古文非可以随意挥洒者也”一语的渊源。由此可见,在南方地区,确实存在不肯模仿佛古人,敢于破律坏度的一脉散文。明代后期,反复古的传统为公安派和竟陵派所继承,变得旗帜鲜明,态度激烈了。公安和竟陵的领袖人物,“楚人”意识非常自觉,也非常浓厚,独创精神更为强烈。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说:“明代楚地文家,多尚独至,能创而不肯因。刘醇骥《四朝三楚文献录序》曰:公安快俊,竟陵深远,遂以相救为奇。张仁熙《三楚文献录艺文志·后序》曰:“或以楚文多自为法,不一辙,故名家者少。然其气剽而悍。公安、竟陵孱弱,而卒以易天下者,气峻而诣独造也。”所强调的是楚地文学的自立自主精神。

纵观中国文学史，自《庄子》、《楚辞》、六朝乐府到具有南方文学特色的宋词，以及明代中叶吴中才子和后期公安竟陵诸家的散文（施蛰存选《晚明二十家小品》，作者全是南方人），正贯穿了这种独创精神。可以这样认为，明代散文就其开拓性和独创性来说，南方文士的成就高于北方作家。这是对历代南方文学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和高度繁荣的结果。

二、陆王心学的崛起与盛行对明代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明王朝建立之初，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推尊程朱理学，维护思想统治。一般人亦以为程朱理学控制明清思想界五六百年。事实不然。当明代中叶社会政治矛盾全面暴露，程朱理学在因应时局的实践活动中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由对程朱的怀疑转向对陆九渊心学的探讨。“先生（王守仁）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明史·儒林传序》论明代学术分流与王学之盛云：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

史臣们所说的“弊”是什么呢？就是冲破了程朱学说的陈旧教条和繁琐修养，在传统思想体系内部启迪了离经叛道的异端，激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反因袭，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王阳明学说对明代士林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是“致良知”。他继承孟子学说，认为良知是先天的，不是后天的，即心之本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答顾东桥书》）。只要修心自悟，体认了这个良知，就人人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这里面是包含着人格平等思想的。二是反对朱学的心、理二分，肯定陆学的心、理合一。强调心外无理；求之于心，则一通百通。理论比朱学更具唯心色彩，但在当时有某种战斗性。王阳明说：